

# 全球价值链调整与西南地区制造业的 高质量发展：困境与路径

张彦 施晓萍<sup>1</sup>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区域经济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 发达国家开启“再工业化”道路, 推动全球价值链进入深度调整期, 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也因此遭遇“产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低端、生产网络发展不均”等“低端束缚”风险。究其原因, 外部环境恶化、攀升动力不足、分工边缘化趋势明显是造成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绿色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为“摆脱束缚、实现攀升”, 西南民族地区需在“十四五”期间抓住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契机, 构建“战略—技术—市场”三位一体发展路径, 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经验。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 民族地区 制造业 低端束缚 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 F062.2;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407(2022)09-056-06

在次贷危机中深受制造业“空心化”之害后, 痛定思痛的发达国家全面启动“再工业化战略”, 即通过布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利用“双转移”牵制攀升步伐, 扼杀创新驱动、实施贸易霸凌, 封锁中国“智造”<sup>[1]</sup>。发达国家的“战略、技术、市场”全面升级与开启“再工业化”道路, 推动全球价值链进入深度调整期, 试图通过重构制造业全球分工网络对中国制造业进行“低端锁定”。全球价值链调整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冲击, 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地区制造业来说, 负面效应更为显著。鉴于此, 本文以西南民族地区(贵州、云南、广西)为例, 分析全球价值链调整期内(2010—2019年)民族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困境, 探究“低端束缚”的表现、成因和对策, 旨在为民族地区制造业“摆脱束缚、实现攀升”探索理论和现实依据, 亦有利于民族地区抓住“十四五”期间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契机, 探索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经验。

## 1 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学者关于全球价值链调整对本土制造业影响的研究。既有研究认为, 全球价值链重构将引发“马太效应”, 可能加剧民族地区制造业发展的“低端束缚”风险,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外生束缚风险。“链主”通过技术和市场两条路径进行施压, 对本土特别是民族地区制造业造成负面影响<sup>[2]</sup>。一方面, 民族地区制造业依赖外部投资的发展模式脆弱性凸显, 一旦外部输血、造血能力不足, 经济发展将持续低迷<sup>[3]</sup>; 另一方面, 民族地区制造业主要以东部市场需求为导向和以承接发达地区技术为主要特点<sup>[4]</sup>, 容易遭受东部发达地区“溢出效应”的影响。二是内生“低端束缚”风险。一方面, 民族地区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底端<sup>[5]</sup>, 且创新能力弱, 不仅未能从价值链调整中获益, 反而成为国内外污染企业的转移目的地<sup>[6]</sup>; 另一方面, 由于高度依赖传统产业, 且在创新投入发展上暂未找到“刀刃”<sup>[7]</sup>, 其“低端依赖”的发展模式在短期还难以得到有效转型<sup>[8]</sup>。

---

<sup>1</sup>**作者简介:** 张彦,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全球价值链、亚太经济、民族经济。E-mail:21003718@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链主压制、创新驱动与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研究”(20CJL020)

有关本土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研究。既有观点认为，创新是突破“低端锁定”的有效途径，相关研究大致分成两种取向：一是创新动力论，认为通过创新要素培育的同时，在外部建构全球创新链，实现“由内至外”转型升级<sup>[9]</sup>；二是创新促进论，认为通过打造先进制造业、提前布局战略新兴产业、加强“一带一路”合作、强化“制度性话语权”，可以摆脱“技术、发展、战略、制度锁定”等问题<sup>[10]</sup>。

综上，梳理与对比现有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一是研究区域创新，西南地区制造业是中国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中较少关注的区域；二是研究视角创新，借助全球价值链理论，建构“国际经济—民族经济”二维理论分析框架，尝试突破传统民族经济研究重视国内价值链的一维视角。

## 2 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困境

### 2.1 制造业产业基础薄弱

(1) 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日渐式微”。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家（地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根本体现<sup>[11]</sup>。然而，通过对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制造业比重偏低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碍。贵州、云南、广西等西南民族地区的制造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不仅其经济贡献度占比偏低，而且还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数据显示，2010年，贵州、云南、广西等西南民族地区的制造业比重均低于全国 40.07% 的平均水平；2019 年，该比重下降至 27.11%、22.83%、24.85%，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制造业在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渐式微”。

(2) 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未老先衰”。“未老先衰”指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过早进入衰退期，从而可能引发“产业空心化”风险。从 2010 年开始，西南民族地区的第二产业比重就迅速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则显著上升，到 2019 年已经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为辅”的产业发展格局。有学者认为，民族地区整体上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向工业化中级阶段过渡时期<sup>[12]</sup>，但就西南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发展趋势来看，其工业化并未完全进入成熟阶段就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衰退”现象。如果“以低端服务业为主、制造业提前衰退”的发展趋势得不到有效扭转，那么民族地区将提前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威胁，这不仅有可能导致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停滞，而且不利于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2.2 制造业产业结构低端

(1) 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高度依赖低端产业。一方面，低端制造业在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中的比重较大。数据显示，2019 年，在贵州、云南、广西等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的生产总值中，低端制造业的比重偏高，且“要素驱动”仍然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以云南为例，其低端制造业占比将近 8 成，而且低端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有色金属冶炼业、烟草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石油加工业。另一方面，低端制造业在民族地区制造业中的比重在增加，这意味着民族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对低端制造业愈发依赖。以广西为例，2010 年其低端制造业的占比为 61.18%，2019 年其比重达到 66.12%，这主要得益于有色金属冶炼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低端制造业的发展。

(2) 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发展高度依赖资源型重工业。长期以来，重工业在民族地区制造业发展中的占比较高，而这一比重仍在不断增加。贵州、云南和广西的重工业占比在 7~8 成之间，且其重工业主要集中在矿产、金属冶炼、能源（石油、电力）等资源依赖性行业，加工层次低，这不仅影响其工业创造利税的能力，而且还影响了其工业积累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以贵州为例，占比将近七成的重工业仅贡献了工业利润和税收的 30%，2019 年，其重工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为 7220.80 亿元，但利税总额仅为 530.74 亿元；而其轻工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为 3224.40 亿元，占比仅为 30.87%，但利税总额达到 1323.03 亿元，占比达到 71.37%。

### 2.3 制造业网络发展不均

(1) 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生产网络的区域不均衡。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生产网络呈显著的区域不均衡发展特征，区域之间的差距较大，而且其制造业基本集中在少数几个市（州），其他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制造业相对匮乏。以云南为例，2019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共有 4366 家，位居前三位的地区分别是昆明市 1006 个，占 23.04%；曲靖市 648 个，占 14.84%；红河州 433 个，占 9.92%。其中，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红河州和楚雄州俗称“滇中城市群”的五州市，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总和 2844 家，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将近七成。其余地区的企业数量和产值占比的比重都很小，像西双版纳、德宏、丽江、迪庆和怒江 5 州市 2019 年的工业总产值加总一共才 762.63 亿元，仅占整个云南的 5.33%。这反映了对于其他大部分制造业匮乏的地区来说，布局制造业的软硬件基础还相对薄弱，这也是制约民族地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2) 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生产网络的层次不均衡。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生产网络较为松散，高端制造业未形成产业集聚优势。通过对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的“区位熵”进行计算，发现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的产业聚集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源型制造业领域，而且其在食品饮料等制造业领域各具优势，比如：贵州在“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C15）”领域、云南在“烟草制品业（C16）”领域、广西在“农副食品加工业（C13）”领域的产业聚集度非常高，形成了具有明显优势的制造业生产网络。但西南民族地区在高端制造业生产网络方面的发展和布局具有较大差异，仅广西的高端制造业布局和生产网络成熟度要高一些，这主要得益于广西近年来布局“汽车制造业产业集群”和“网络通信及新型中高端电子产品产业集群”。不过，相较于国内其他制造业较为发达的省份来说（比如广东、江苏等），广西高端制造业的产业聚集度还不显著，其制造业生产网络优势还不明显（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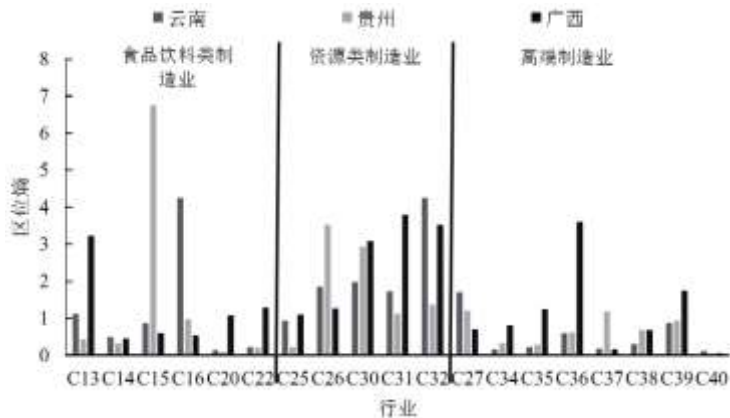


图 1 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的“区位熵”

注：食品饮料类制造业包括：C13 农副食品加工业，C14 食品制造业，C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C16 烟草制品业，C17 纺织业，C18 纺织服装、服饰业，C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C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C21 家具制造业，C22 造纸和纸制品业，C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C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资源类制造业包括：C2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8 化学纤维制造业，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C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3 金属制品业；高端制造业包括：C27 医药制造业，C34 通用设备制造业，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C36 汽车制造业，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40 仪器仪表制造业。另外，由于部分制造业的“区位熵”不显著，说明该类行业在西南民族地区没有产业聚集优势，故不在图中显示，如：C17、C18、C19、C21、C23、C24、C28、C29、C33 等。

### 3 全球价值链调整对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3.1 外部环境恶化

作为全球价值链“链主”的发达国家开启了“再工业化”进程，通过制造业的“双转移”（高端制造业回流，低端制造业转移），重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这对民族地区制造业的发展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冲击。

（1）西南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在恶化。全球价值链调整期内，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陷入了“低端强、高端弱”的发展困境，即低端制造业的比重在增加，高端制造业的比重在减少。比如：2010—2019 年，贵州、云南、广西的高端制造业比重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低端制造业占比提升。究其根源发现，这实际上与“链主国家”的“制造业双转移”战略有密切关系。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政策手段促进高端制造业回流国内<sup>[13]</sup>，低端制造业也向东南亚国家等转移。西南民族地区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在恶化，且难以获得从东部地区转移的低端制造业产业链，客观上促进了“资源密集型”重工业比重的增加。

（2）西南地区制造业的脆弱性风险增加。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深度调整，导致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的脆弱性风险凸显。深受“贸易战”和“逆全球化”等趋势的影响，近两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量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而西南民族地区的影响则更大，对外贸易的出口额逐年减少，其中云南甚至连续两年出现贸易逆差的现象。由于“逆全球化”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西南民族地区的对外贸易量将会受到持续的影响。

### 3.2 攀升动力不足

（1）西南地区制造业的创新环境不足。一方面，西南民族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明显不足。根据《2019 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西南民族地区三省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数最高的贵州不超过 500 家，三省区总计数仅为 1084 家；江苏的高新技术企业个数是三省区的 4.49 倍，广东甚至是三省区的 7.86 倍。西南民族地区三省区的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均不超过 13 万人，合计数约为 31.5 万人，但江苏和广东的从业人数分别超过了 200 万人和 400 万人，分别是三省区的 7.05 倍和 12.35 倍。另一方面，西南民族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利能力明显不足。从高新技术产业所带来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中可以直观地看到，西南民族地区各省区的高新技术产业营业收入最高不超过 1500 亿元，三省区合计为 3347 亿元，不超过广东、江苏两省的 13%，分别占广东比重的 7.16%和江苏比重的 12.79%。贵州的高新技术产业利润总额不到 75 亿元，广西及云南均为 108 亿元，三省区合计数不超过 300 亿元，远远少于已经超过 1500 亿元的广东和江苏，广东、江苏两省分别是三省区的 8.08 倍、6.15 倍。

（2）西南地区制造业的创新投入不足。贵州、云南和广西三个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仍较为落后，严重制约了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虽然西南民族地区的 R&D 经费投入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并没有缩小。从 R&D 人员方面来看，贵州、云南和广西在研发人才方面的投入更是不足，2019 年的 R&D 人员仅为 2.32 万人、2.94 万人和 2.21 万人，远远落后于全国 10.17 万人的平均水平，与广东的 83.89 万人相比，更是差距甚大。因此，由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创新投入不足，导致了其高科技技术和人才短缺，以致制造业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国制造业平均水平。

（3）西南地区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不足。一是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近十年来，西南民族地区的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和专利申请授权量占比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比如：2010—2019 年，云南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和专利申请授权量占其总量的比重从 2011 年开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19 年，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和专利申请授权量占比达到最低，不足 26%，这说明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明显不足。二是西南民族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能力弱。西南民族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绝对数量较小，而且具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量更少。2018 年，西南民族地区的 1084 个高新技术企业中，仅有 176 个是设有研发机构的高新技术企业，平均 100 个高新技术企业中有 16.24 个研发机构。西南民族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比重不仅较小，且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有较大差距。比如：相较于广东、江苏平均每 2 家企业就有 1 家研究机构，西南民族地区平均每 7 家企业仅设有 1 家研究机构。

### 3.3 边缘化趋势明显

(1) 西南地区制造业产业链的国际化程度低。产业链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链主国”的跨国公司到“参与国”进行投资,在“生产—技术”端建立制造业的跨国生产网络。从西南民族地区的情况来看,由于其制造业产业链不成熟,难以吸引外商投资建构跨国生产网络,而且外商投资的重点也并未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因此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产业链的国际化程度明显偏低。一是西南民族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不足,外商投资数量较少。2019 年贵州、云南、广西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法人个数仅为 621 个,仅占全国比重的 1.42%。其中,云南和贵州的制造业产业链国际化程度最低,以云南为例,其“外商及港澳台”投资资产总计与营业收入都不足 700 亿元,利润总额仅有 34.66 亿元,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更是只有 3.82 万人;相较而言,广西的国际化程度稍高,创造了 3551.18 亿元的营业收入和 231.28 亿元的利润总额,但仅相当于广东的 7%,仅占全国的 1.40%。二是西南民族地区的制造业并非外商投资的重点,难以形成成熟的产业链。从西南民族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特点来看,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资源型重工业等行业,制造业并未成为投资的重点。比如:到广西投资的外商看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主要是该行业的投资期限较短、资金回报率较高。又比如:到贵州投资的外商,看重贵州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例如美国旗盛公司在六盘水投资建设的煤焦化项目<sup>[14]</sup>。

(2) 西南地区制造业供应链的国际化程度低。供应链是全球价值链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涉及全球价值链“参与国”生产的最终产品出口,从而从“消费—渠道”端建立跨国市场网络。一是西南民族地区的供应链国际化程度较低。通过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对外贸易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供应链的国际化程度偏低。数据表明,贵州、云南和广西出口贸易额占全国出口贸易的份额仅为 0.19%、0.60%和 1.51%。而且,受“贸易战”和“逆全球化”的影响,贵州和云南的出口贸易份额还出现了下降的情况,不仅贸易顺差减小,而且云南近两年还出现了贸易逆差。二是西南民族地区的供应链有明显的分散性和地域性。由于西南民族地区与东南亚国家接壤,与相邻国家开展边境小额贸易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方式。以广西为例,2019 年其对外贸易额中,边境小额贸易比重占比达到 40.83%,超过了一般贸易比重的 31.45%,而且进料加工贸易的比重不高,仅为 16.7%。这说明西南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具有较为明显的分散性和地区性特征,其对外贸易主要以边境小额贸易和最终品贸易为主,涉及中间产品的加工贸易占比偏低,未能形成规模化的供应链。

## 4 全球价值链调整下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面对全球价值链调整所带来的全方位压力,我国应重点构建“战略—技术—市场”三位一体的立体式高端攀升路径(图 2),有效突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下的“低端束缚”负面影响,全面推动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 4.1 探索“双循环+区域价值链”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战略路径

(1) 抓住“双循环”与“区域价值链”战略发展机遇。为应对全球价值链调整导致的外部环境恶化,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在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双循环”发展战略和区域价值链发展路径<sup>[15]</sup>,这给西南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历史发展契机。一是“双循环”大格局的战略契机。过去,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以“外向型”发展为主,制造业的发展更是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这是造成东部和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产业联动不紧密的关键原因。当前,在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大格局下,培育和构建制造业国内价值链(NVCs)将成为重中之重,东部发达地区亦需调整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布局,以此为契机探索和重构“东西联动发展的制造业价值链体系”,将成为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发展的战略契机。二是“区域价值链”重构的战略契机。RCEP 区域价值链重构将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受阻提供“区域解决方案”,其中东盟国家是 RCEP 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重构的重点对象,这对于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缘上比邻东盟国家的省份来说是重大的历史发展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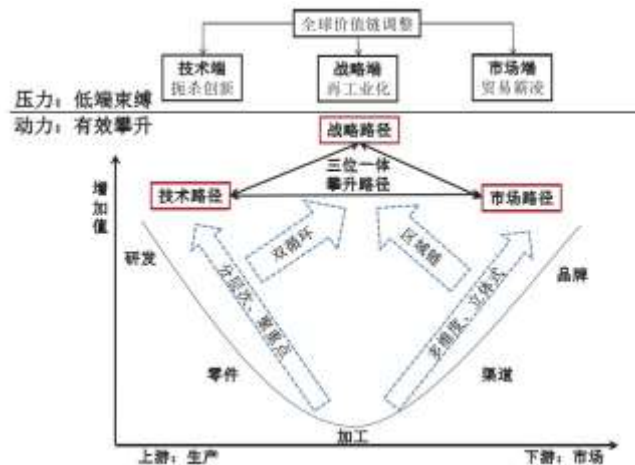


图2 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战略—技术—市场”三位一体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

(2) 重构西南地区制造业发展的战略定位。这既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枢纽，又是“国内价值链（NVCs）”和“区域价值链（RVCs）”的交汇点，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将大有可为。从“一带一路”的“五通”目标来看，西南民族地区优势明显。因此，西南民族地区应找准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身份定位，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发挥“桥梁作用”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国家”，先行探索建构“东起粤港澳大湾区，西接西南民族三省，南下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

#### 4.2 探索“多层次”“聚重点”的技术提升路径

(1) 引导优势产业“双向”攀升全球价值链。一是引导民族地区优势产业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一方面，引导西南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型制造业加大创新技术投入，改善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低、附加值低、能耗高”的不利局面，提升其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水平。另一方面，引导西南民族地区优势制造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引导优势龙头企业在“双循环”和“区域价值链”战略背景下，拓展国内和海外业务，布局内外产业链和供应链，提升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二是引导民族地区优势产业提升品牌形象，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族品牌。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中，贵州的酒、云南的烟和广西的农副产品等均为其优势产业，也是国内具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行业。不过，在国际上这些品牌的知名度较低，与世界知名的酒类、烟草类等品牌的差距仍非常大。因此，引导这些行业走国际化、品牌化路线是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有效攀升的关键路径。

(2) 重点布局高端制造业产业集群。一是打造重点产业，“以点带面”布局高端制造业生产网络。西南民族地区的部分高端制造业是具有产业集群潜力的，比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广西）、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贵州）、医药制造业（云南），这些行业中不乏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如广西汽车集团（柳州五菱）、云南白药集团等。因此，通过倾力打造龙头企业，并培育高端制造业生产网络，是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路径。二是加大创新投入，吸引高端人才。西南民族地区需继续改善营商环境，通过税收减免、政策倾斜和补贴支持等方式，吸引更多的高新科技企业进入。同时，应当加强对高新科技人才的引进力度，实现创新要素的区域聚集。

#### 4.3 探索“多维度”“立体式”的市场发展路径

(1) 探索制造业攀升的“市场双轮驱动”模式。一方面，以“国内市场”培育制造业发展。在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大格局中，国内制造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将被重构。中国国内特别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潜力巨大，有利于培育“西部—东部”的区域制造业供应链网络体系。西南民族地区可主动承接东部转移的低端制造业，而东部地区可以利用“市场优势”主动帮助民族地区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升级，构建“东—西”协调发展的区域价值链体系。另一方面，以“国际市场”培育

制造业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 成员国家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sup>[16]</sup>，为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广西的汽车行业发展为例，在沿线国家中不少国家有较为成熟的汽车生产网络（比如泰国），且沿线国家对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需求巨大。因此，在沿线国家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拓展沿线市场需求等，给以五菱汽车为龙头的广西汽车和汽配行业的发展带来重要契机。

（2）探索制造业攀升的“产业化”和“品牌化”模式。除“技术”和“渠道”以外，“品牌化”是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另一条重要路径。以民族特色手工制品行业为例，意大利、芬兰等欧洲国家为民族传统特色产品的“产业化”和“品牌化”提供了先行经验，其部分做法值得西南民族地区借鉴，比如：意大利的文化创意小镇模式<sup>[17]</sup>，通过对“文化”“经济”“品牌”“旅游”“服务”的有效结合，将产品的“文化价值”和“审美属性”融入商品和服务中；芬兰的工业设计和艺术设计培育模式，其通过培养一大批手工艺人，推动现代化的工业设计和艺术设计理念与民族手工艺产品相容，助力其手工业产品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品牌。因此，从国外的先行经验来看，西南民族地区可推动民族特色手工业的产业化和品牌化战略，通过打造民族特色产业园区，培育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特色产业的产业化、品牌化和国际化进程。

#### 参考文献：

- [1]张彦.全球价值链调整与中国制造业的攀升风险：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J].情报杂志, 2020(12):40-49.
- [2]马楠.区域异质性视角下民族地区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5):83-88.
- [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报告（2019）[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9.
- [4]荆林波.全球价值链变化新趋势及中国对策[J].管理世界, 2019(11):72-79.
- [5]谌利民,王皓田,徐照林.民族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 2018(5):160-165.
- [6]徐江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路径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 2019(3):145-150.
- [7]乌兰,花蕊.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分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2):70-74.
- [8]曹颖轶.少数民族特色产品产业融入中亚价值链研究[J].生产力研究, 2017(11):8-12, 52.
- [9]谢作渺、王建文、黄妙环.民族地区创新投入、政策支持与主导产业经济增长研究[J].财经理论研究, 2020(3):1-13.
- [10]刘琳.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147-152.
- [11]刘志彪.低碳：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新约束[J].南京社会科学, 2016(3):152-156.
- [12]赵龙跃.全球价值链时代如何更好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路径分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7(7):151-165.
- [13]苗圩.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J].机械工业标准化与质量, 2019(5):9-13.
- [14]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报告 2018[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8.

---

[15]刘秀玲. 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8.

[16]张彦. RCEP 区域价值链重构与中国的政策选择——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基础[J]. 亚太经济, 2020(5):14-24, 149.

[17]王经绫. 民族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 “第三意大利”的发展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世界民族, 2019(6):92-105.